

白眼向天四百年 他不是画花鸟,是在画自己

2026年,八大山人诞辰四百年。这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中国古代十大文化名人”的明末清初画家,成为近日全国多家博物馆的重磅特展主角。

八大山人有什么迷人之处,能让400年后的人仍对他心魂系之?



八大山人山水册页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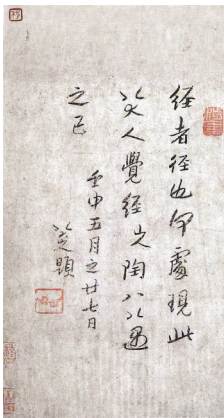
寿鹿图轴



荷石水鸟图



八大山人山水册页之一



行书题八大入觉经页

八大山人是朱耷的号,他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献王朱权的九世孙。其祖父朱多烺是晚明著名画家,父亲朱谋覲亦擅长书画。朱耷自幼耳濡目染,八岁能诗,十一岁能画山水,少时已展露不凡才华。

然而崇祯十七年(1644年),清兵入关,明朝灭亡,当时年仅19岁的八大山人几乎在一夜之间遭遇亡国之痛。据清人邵长蘅《八大山人传》记载,“甲申国变,山人遂弃家,遁奉新山中,剃发为僧。”明宗室上下如惊弓之鸟,“改姓易氏、匿迹销声、各逃性命”。他在山中一住就是二十年,法名传綮,跟随他学习的僧众有一百多人。

在八大山人纪念馆展厅内,观众得以一睹《个山小像》。个山是朱耷另一个号。这幅由八大山人老友黄安平于1674年绘制的肖像画,是现存唯一公认的八大山人真实画像。画中人物“相貌清癯,双目沉静”,头戴斗笠,身着宽袍。原作上八大山人自题“甲寅蒲节后二日,遇老友黄安平为余写此,时年四十有九”,学者据此确认其生年为天启六年(1626年)。画面上九段题跋全部出自八大山人之手,后人据这九段跋文,得以窥见他的人生经历,包括身世身份的揭示、出家经历、还俗心路等。《个山小像》于1954年在江西奉新奉先寺被发现,几经周折,现藏于江西南昌八大山人纪念馆。

与《个山小像》相呼应的,是一方“西江弋阳王孙”朱文印。这方印章向世界宣告自己无法抹去的皇室血脉。这枚印章表露出他无法割舍的过往,出家与入世之间的内心纠结。出家后的朱耷,深居古

寺,青灯为伴。然而国变之痛始终郁结于心,唯有通过笔墨抒发心中愤懑,他的画作通常呈现孤冷空寂的意象,通过极简的笔墨建构空灵深远的意境。

据邵长蘅《八大山人传》记载,临川县令胡亦堂闻其名,将他请到官舍住了一年多。谁知“年余,竟忽忽不自得,遂发狂疾,忽大笑、忽痛哭竟日”。有一天晚上,他撕裂了自己的僧服,一把火烧掉,徒步跑回了南昌城,“独自徜徉市肆间,常戴布帽,曳长领袍,履穿踵决,拂袖翩跹行”,孩子们跟在后面围观哄笑,没有人认得这个疯疯癫癫的人是谁。有人说他是在“愤世佯狂”,是真疯还是装疯,至今无人能断。史书记载他一生曾多次发作“癫疾”。这种在清醒与迷狂之间的撕扯,让他的笔触获得了某种超越常人的力度。

同样的情绪也弥漫在他的山水画中。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古梅图轴》作于他思想极度苦闷的时期。画上一株老梅,枝干扭曲盘结,仿佛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画上三段题跋,“字字凝思,句句含情”,家国破碎、身世沉浮,一切起伏皆化为笔下枯枝寒梅。

同为“清初四僧”之一,八大山人与石涛虽毕生未曾谋面,却惺惺相惜。据年谱和史料研究,八大辈长于石涛,年龄相差16岁左右。二人不仅有书信往来,还有画事上的合作,八大山人画兰石,石涛补竹;石涛画桃源图,八大山人作《桃花源记》;八大山人画水仙,石涛题诗。

最广为人知的,是石涛晚年致八大山人的一封长信,求他为自己画《大涤草堂图》。信中石涛写道:“向承所寄太大,屋小放不下”,你上次寄来的画太大了,我家屋子小挂不

下,这次只求“三尺高一尺阔小幅”。言语间透着老友般的随意与亲近。在写给友人方士琯的信札中,八大山人谈到石涛时说道:“与惠崇之得尊者笔墨,是一是二,山人远拜下风。”这位对画艺自负甚高的老人,以“甘拜下风”四字推崇石涛,可见二人之间超越时空的惺惺相惜。北京匡时拍卖曾释出的八大山人《与石涛书画合璧册》,正是二人情谊的珍贵见证。

八大山人最具辨识度的,是那些“白眼向天”的鱼鸟。这些鱼鸟“以白眼傲然于孤独世界”,运笔泼辣,极富浪漫色彩。他画的鱼大都“白眼向人”,以此来表现自己孤傲不群、愤世嫉俗的性格,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花鸟造型。

江西省博物馆展厅中展出了故宫博物院藏的《枯木寒鸦图》。画面上一只寒鸦独栖枯枝,翻着白眼望向画外,疏旷空寂,不画背景,仅以极简的笔墨便建构出深远的意境。据策展人介绍,“这些欹侧摇曳的残荷、奇崛孤高的怪石,并非随意挥洒,而是其磊落不羁人格的视觉印记”。

中国美术馆“墨韵文脉”展出的《鹤鹿凫雁图》,是画家70岁左右的精品。画中白鹤立于古松,鹿眼“呆萌”冷冷直视画外,昂首瞪眼的鸭子立于石上。整幅作品抒写了八大山人晚年尚存的郁闷心境,传递出孤寂清冷的意境。中国美术馆研究馆员邓锋有一个精辟的观察:八大山人笔下的禽鸟“眼部形态非常丰富,有圆眼、方眼,有睁眼,也有闭眼休憩”,某种程度上,“禽鸟眼部也是八大山人生命情状的

一种投射”。

荣宝斋“可得神仙”展中展出的《花鸟四屏》同样引人注目。这件八大山人晚年精品,以大写意手法绘莲花、孤禽、芭蕉、湖石,笔墨简练而意蕴深厚。画中孤禽缩颈独足,翻着标志性的白眼,与八大山人晚年孤寂心境互为映照。

步入晚年,八大山人的艺术达到炉火纯青之境。八大山人纪念馆的核心展品《河上花图卷》,全卷展开近20米,画心达12.95米。这件72岁时的作品集花鸟、山水、书法于一体,被公认为八大山人将写意技法发挥到极致的巅峰之作。因受展柜尺寸限制,此前在天津博物馆从未全卷展开。在南昌正在展出的八大山人特展中,观众得以首次完整欣赏这幅水墨巨制的每一处细节。全卷以荷花为主线,从夏之盛放到秋之枯败,笔墨纵逸酣畅,将“笔简形具、得之自然”的风骨展现得淋漓尽致。

八大山人留存世间的书画作品并没有精确统计数据,已知的故宫博物院藏有118件,八大山人纪念馆藏有40件左右,正在江西南昌举办的特展,则汇集了全国22家文博单位的123件(套)原件,是迄今最大规模专题展。

从《个山小像》中那位“相貌清癯”的青年王孙,到遁入空门的僧人,再到《河上花图卷》中纵笔挥毫的艺术宗师,四百年后,正是通过这一件件文物,我们得以窥见八大山人从末世王孙到一代宗师的完整人生轨迹。那些翻着白眼的鱼鸟、哭之笑之的签名、空寂孤绝的山水,它们从来不只是“风格”,而是一个没落王孙在命运重压下,如何守住内心最后一点尊严的全部证物。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臧磊

赞达亚的耳环 怎么惹怒了考古界



一对出现在电影发布会上的耳环怎么会惹怒考古界?最近,女星赞达亚正在全球多地为影片《奥德赛》宣传,在伦敦站的媒体发布会上,赞达亚佩戴了一对古典风格的金色耳环,然而这对耳环却引来了意想不到的风波。

赞达亚佩戴的这对耳环来源于伦敦古董珠宝商巴伦公司,该公司介绍这对耳环是由两枚约公元前7世纪、来自古代伊朗的金质圆形饰牌改制而成,年代距今约2700年。消息公开后迅速引发了考古学界的质疑,考古学者认为这可能是一件具有考古价值的文物,而且该文物本身并不是耳环,可能是一种服饰构件或者礼仪装饰。最终巴伦公司表示该耳环来自梓维耶宝藏,强调文物有完整的收藏流转记录,来源完全合法,且镶嵌方式不会对原件造成永久损伤。赞达亚的这对耳环是否真的来自梓维耶遗址,如果是的话又是如何流散到珠宝交易市场的?这些问题仍在争论不休。

古代珠宝经过改造变成现代装饰品的不少见,这对耳环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声称来源于梓维耶宝藏,这是一个在考古史上长期存在争议的名字。梓维耶是位于伊朗西北部的一处古代城堡遗址,1948年,法国考古学家安德烈·戈达尔公开了一批古代文物,称这些文物出土于伊朗梓维耶古代遗址。安德烈对外声称,1947年梓维耶村村民偶然在高处城堡山丘中发现了一箱文物,村民们将文物瓜分出售,其中仅有部分文物被登记。当时社会各界普遍采信了安德烈的说法,此后数十年间出现了数百件没有明确出土背景、来源不明的文物自称是来源于梓维耶遗址,这些文物流传到了美国、欧洲各地古董店,有的被私人藏家购得,有的进入拍卖行公开拍卖。

近些年来,古董市场上流通的所谓的“梓维耶宝藏”备受争议,一方面,确实存在来自梓维耶遗址的文物因盗掘而流散,另一方面,安德烈所描述的梓维耶宝藏发现故事也受到了质疑,有人提出其中存在说不通的矛盾之处。还有学者怀疑许多号称来自梓维耶遗址的文物是冒名顶替的仿制品或是其他文化遗址文物被张冠李戴。

安德烈·戈达尔已于1965年去世,他的妻子耶达·戈达尔保存了丈夫收藏的梓维耶遗址文物。耶达1976年在巴黎去世,去世前她安排将梓维耶遗址文物捐赠给卢浮宫博物馆,1977年卢浮宫正式将文物入藏东方文物部。现在在卢浮宫博物馆官网可以搜索到228件梓维耶遗址文物。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沈昭